

预告扭亏后高管减持 恒银科技“AI+”转型期研发投入收缩

实习记者 许璐 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银行网点数字化转型机遇浪潮中,什么样的金融科技公司才能分一杯羹?

近期,恒银科技(603106.SH)发布2024年财报,实现营业收入4.37亿元,同比增长2.53%,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012.36万元,较去年的亏损2.08亿元大幅扭亏为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039.66万元,显示出经营回升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恒银科技归母净利润连续11个季度为负后迎来扭亏。

恒银科技核心产品涉及ATM、存取款一体机、智慧柜员机等设备的研发制造,但随着近年来移动支付的普及,传统现金设备需求变弱,以及客户采购价格降低,公司处于新老业务交替的转型期。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恒银科技此次扭亏与非经常性损益关系较大。同时,在公司“AI+”转型的关键期,公司的研发费用却在逐年下降,相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申报数量也在逐年递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左鹏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市场要求金融智能终端加快从单一业务工具升级为“智能化、生态化、安全化”服务枢纽,这需要机构方积极升级适应。

依赖政府补助扭亏

恒银科技的扭亏与非经常性损益关系密切。根据2024年年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2657.26万元与所购买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695.55万元成为利润关键来源,占比达到83.56%。

恒银科技成立于2004年,根据官网信息,公司集金融智能终端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是一家智慧银行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布局国内外。

根据2024年年报,恒银科技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37亿元,同比增长2.53%;归母净利润为4012.36万元,上年同期为-2.08亿元,同比增长2.48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08元,同比增加0.48元。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2年第一季至2024年第三季度,恒银科技已连续11个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负值,分别约为-1831万元、-4595万元、-7942万元、-1.521亿元、-2968万元、-4349万元、-6301万元、-2.080亿元、-2119万元、-3665万元、-3580万元。截至2024年年末,该数值约为4012万元,也是2022年以来首次实现扭亏为盈。

2024年的扭亏,第四季度的业绩起到关键作用。根据年报,恒银科技2024年第四季度实现总营收1.80亿元,同比增长43.89%,环比增长132.46%;归母净利润7592.75万元,同比增长152.38%,环比增长8830.29%;扣非净利润6168.29万元,同比增长170.47%,环比增长775.79%。

记者了解到,金融设备行业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征。国内商业银行通常遵循“上半年制定年度设备采购计划、年中完成设备选型、三四季度确定供应商并签订采购协议”的采购周期。恒银科技2020至2023年分季度财务数据显示,第四季度营收规模持续高于前三季度营收的平均水平。

根据此前恒银科技2024年年

传统设备商转向多元业务

一位银行人士向记者透露,近年来银行网点到访客户锐减,业务办理加速向远程视频柜员机(VTM,一个非现金类设备)迁移,但VTM设备数量并未同步增加,侧面反映出线下金融场景的萎缩趋势。

恒银科技早年间以ATM、存取款一体机、智慧柜员机等设备的研发制造为主,近年来产品收入结构呈调整趋势,整体来看,公司正加速从传统现金设备业务向多元化业务转型。

央行数据显示,中国ATM机数量自2018年峰值111.08万台持续下滑,2024年年末仅剩80.27万台。与此同时,银行网点数量自2017年开始进入收缩期,2024年总量减少1455家。这一趋势对恒银科技的传统业务构成直接冲击。

一位银行人士向记者透露,近年来银行网点到访客户锐减,业务办理加速向远程视频柜员机(VTM,一个非现金类设备)迁移,但VTM设备数量并未同步增加,侧面反映出线下金融场景的萎缩趋势。

根据恒银科技财报,作为传统

研发投入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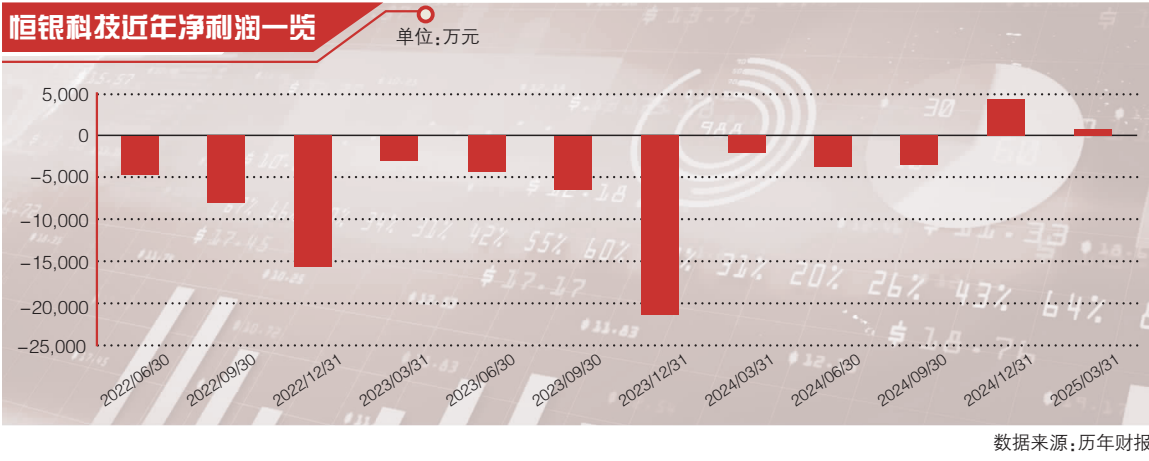
与“AI+”战略有所矛盾的是,恒银科技在加大智能化转型的同时,研发费用却从2020年的1.01亿元减少至2024年的4850万元,降幅约51.98%。

近年来,恒银科技正加速向“AI+”战略转型。

官网信息显示,公司自主研发的AI管理平台已覆盖语音识别、远程视频交互等核心功能。

此外,公司在业绩扭亏因素中提到“新一代机芯系列产品降低生产成本”,但技术突破细节未公开,具体成本下降幅度亦未明确。

但与“AI+”战略有所矛盾的



报业绩预告,公司扭亏原因包括:成本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提升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2024年度海外销售额取得较大增长。

不过,记者注意到,恒银科技的扭亏与非经常性损益关系密切。根据2024年年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2657.26万元与所购买的股票公允价值变动695.55万元成为利润关键来源,占比达到83.56%。而2020年—2023年恒银科技的政府补助多在百万级别。

同时,恒银科技近年的持续亏损也与非经常性损益有关。据2022年财报,公司因信托产品违约(涉及金额1.85亿元)导致亏损加剧;2023年再度因同一信托计划逾期未兑付计提50%减值(约9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业绩预盈发布同期,恒银科技公告公司董事、副总裁张云峰计划减持不超过34.8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70%,占其持股总数的25%;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王伟计划减持不超过18.2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50%,占其持股总数的25%。根据官方信息,此次减持是因个人资金需求。

但作为业绩预盈后的减持,也有市场声音对此持保留态度。对于上述减持时机,以及如何强化自身造血能力等问题,记者致函恒银科技,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财政兜底”首次被点名 隐性债务治理亟须创新手段

本报记者 石健 北京报道

近日,财政部官网通报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其中首次提及了因“财政兜底”而造成的新增隐性债务。

政企权责模糊

此次财政部通报的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河南、云南和青海6地的地方政府及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违规内容包括捆绑包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及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借款新增隐性债务、通过国有企业垫付资金建设楼堂馆所新增隐性债务等典型新增隐性债务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通报案例首次提到了PPP项目因“财政兜底”而新增隐性债务的情形。

“政府承诺最低收益这种情况,在监督检查中基本会被认定为违规。但是,进入财政部通报的,尚属首次。这也表明,对于管理库存量PPP违规的打击,将会与对其他类型新增隐性债务违规的打击一样,逐渐成为常态化工作。”谈及此次财政部关于PPP项目的通报,一位地方政府人士这样说。

财政部通报显示,2019年至2021年12月,经佳木斯市政府授权,佳木斯高新区、佳木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佳木斯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通过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 移交—经营—移交)、BOO(Building—Owning—Operation 建设—拥有一经营)、BOT(Build—Operate—Transfer 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实施佳木斯高新区污水处理厂项目、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工程等3个政府特许经营权项目,承诺社会资本方最低收益回报、固定收益率和回购社会资本方投资本息等,形成新增隐性债务15.73亿元。

记者梳理发现,此前亦有TOT模式违规遭到财政部通报,但是原因系项目没有进入管理库。但是此次通报与之前有所不同,此次违规涉及“财政兜底”。

对于上述提到的3种模式,中华环保联合会农业环保专委会秘书长袁秀丽对记者说:“简单来说,TOT模式是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将建成项目一定期限的产权或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资人运营管理,投资人在约定期限内通过

经营收回投资并获取合理回报,合约期满后项目交还政府部门或原企业的融资方式;BOO模式是承包商依据政府特许权建设和经营产业项目,且无需移交公共部门;BOT模式是政府就基础设施项目与私人企业(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权其承担项目投资、融资、建设和维护,在特许期内经营特定公用基础设施,通过收费或出售产品收回投资获利,政府保留监督权和调控权,特许期满私人企业将基础设施无偿移交政府。”

对于上述3种社会资本模式,为什么政府会进行兜底承诺?袁秀丽举例说:“比如新建小区需要配套自来水厂,这时政府引进第三方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及运营。不过,新建小区在交房后的一段时间,不可避免会出现入住率低的情况。政府为了能够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就会承诺兜底收益,而差额补足的部分就无形之中新增了隐性债务。”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对记

者表示,随着PPP模式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开展项目的常用手段,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项目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分类处理的意见》《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目的在于规范地方政府及地方融资平台开展PPP项目,杜绝“财政兜底”。

在袁秀丽看来,杜绝“财政兜底”,不等于不能为项目担保。“这里的‘财政兜底’,指的是不能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通过有收入的国有企业进行担保,来实现项目的安全性。”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鲁璐对记者表示,2023年12月国家发改委文件已经表明,将PPP模式范围缩窄至基于使用者付费特许经营模式,严禁地方政府变相举债,此次问责向PPP项目各参与方敲响了警钟,再次彰显了中央对隐性债务问题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决心。

探索化隐债新手段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财政兜底”现象的出现,归根到底还是当地没有做好政企权责明晰。事实上,典型案例也在提示城投平台要加快实现市场化的转型,不能依托地方政府进行投融资、经营项目。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创新机制,来制约“财政兜底”现象的出现。如上海临港新片区试点创新“项目收益自平衡”机制,要求基础设施项目必须匹配经营性资产,通过租金、特许经营等收益覆盖债务本息,减少项目对财政资金的依赖;深圳创新设置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财政健康度评级,评级结果与发债额度挂钩,倒逼财政透明度提升;雄安新区探索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应用,在专项债资金使用中嵌入智能合约,确保资金流向与项目进度自动匹配,防止挪用。

方达咨询研究员认为,此次通报涉及的案例也为城投平台转型提供另外一个思考空间。一方面,信用剥离加速。典型案例显示政府信用背书已构成违规,城投必须彻底切断“财政兜底”预期,通过资产重组、混改等方式建立独立市场化信用体系。另一方面,城投公司需要债务结构再造。从“融资代建”向经营性资产运营转型,重点培育城市服务、产业投资、数据资产运营等现金流业务。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应该积极融入“前端约束—中端监控—后端处置”的全周期债务治理体系。

采访中,有地方政府人士表

示,随着地方化解隐性债务走深走实,未来存量隐性债务的化解,不能单纯依靠债务置换等传统手段进行,而是要探索地方隐性债务治理的创新手段。尤其是对于未来新增的隐性债务,一方面需要探索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推动“权责发生制”财政管理,增强债务透明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债务置换释放的地方财政空间,应优先投向新基建、民生保障等领域,形成“化债—投资—增收”良性循环。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也在探索利用科技手段监测化解地方债务。如广东、浙江等地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债务监测平台,实现资金流向全流程追踪;浙江运用区块链技术对专项债“借、用、管、还”全流程追踪;江苏试点“政府投资项目合规性智能审查系统”,从源头上拦截违规融资。

朱静表示,当前隐性债务治理已进入“存量化解+增量严控”的深水区,需警惕城投非标债务违约引发的连锁反应。未来防范重点应转向健全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建立跨区域债务风险联防联控机制、探索政府资产负债表管理等制度创新。

朱静建议,要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按照预算法规定编制和执行预算,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硬约束,确保财政资金合理分配和有效使用。同时,规范PPP项目运作,严禁违规捆绑包装项目,在特许经营权协议中不得承诺社会资本方最低收益回报、固定收益率和回购社会资本方投资本息等。